

江苏“大学叙事”的文化抒写及地域特征

吴延生¹

【摘要】：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新时期以来，作为知识分子重要场域的大学也同样走进了文学的视野，“大学叙事”逐步活跃起来。本文以江苏“大学叙事”的小说文本为研究对象，阐述江苏“大学叙事”的文化抒写及其地方特色，呼吁学界乃至社会对江苏“大学叙事”的文化价值、社会价值、审美价值等予以全方位的关注。

【关键词】：校园文学 大学叙事 《围城》 《文人》

“大学叙事”作为一种题材划分，可以追溯到“五四”时期的文学，但数量很少。中国第一个尝试白话写作的江苏女作家陈衡哲于1917年发表了短篇小说《一日》；老舍《赵子曰》、陈白尘《漩涡》是20年代“大学叙事”的代表；30年代问世了沈从文的《八骏图》、阳翰笙的《大学生日记》、叶圣陶的《英文教授》；到了40年代，钱钟书的《围城》则是“大学叙事”的里程碑之作。新中国成立后，出现了《大学春秋》（人民文学，1981）《大学时代》（人民文学，1980）《红路》（作家，1959）《青春之歌》（作家，1958）等政治化痕迹十分明显的小说。新时期以来，“大学叙事”形成强劲的创作势头。一方面是知识分子写作。生活在校里的教师、教授们，大胆解剖、暴露当前大学校园真实存在并为社会所诟病的诸多问题。如《大学潜规则》（人民文学，2010）《风雅颂》（江苏人民，2008）《中戏女生》（金城，2003）《中国女博士》（人民文学，2010）《高等学府》（江苏文艺，2010）等；另一方面是青春写作。这主要是一大批青年学子。如《此间的少年》（华文，2007）《北大女生》（中国工人，2003）《草样年华》（远方，2004）等。这两方面创作都有很强的自传色彩。也有一些回忆性散文，如《西南联大行思录》（三联，2013）《北大回忆》（三联，2014）《永远的清华园》（北大，2013）等。其它如长诗《中文系》（北师大，1992）、报告文学《一个女大学生的足迹》（四川人民，11998844）等。

江苏“大学叙事”在陈白尘长篇小说《漩涡》，钱钟书长篇小说《围城》等奠定基础后出现了可喜的创作成就。如程树榛长篇小说《大学时代》，康式昭、奎曾长篇小说《大学春秋》，葛红兵长篇小说《沙床》（长江文艺，2003），格非长篇小说《欲望的旗帜》（上海文艺，2013），黄梵长篇小说《第十一诫》（吉林出版社集团，2009），宋浩浩长篇小说《双山》（长征，2009），裴文长篇小说《高等学府》（江苏文艺，2010）《文人》（江苏文艺，2016），尹平长篇小说《变革》（江苏文艺，2014），曹征路中篇小说《大学诗》（《小说月报》，2014）《南方麻雀》（《清明》，2012），方方中篇小说《行云流水》（《小说界》，1991）《定数》（《山花》，1996）《无处遁逃》（北师大，1993）等等，反映了江苏大学叙事的发展脉络，积淀深厚。

本文所谓江苏“大学叙事”，是指作者出生、生活在江苏，对江苏“大学叙事”做出贡献；或是在江苏出生、成长以后走出，在异乡“建功”的作家。因为从小生活在特定的文化圈内，受地方文化的熏陶和浸染，加之作家个体同生养地的文化母体无法割断的精神联系，使他们难以抹去深受地域文化传统影响的深刻印痕。至于过境作家对“大学叙事”做出贡献的可作参照研究。

一、智性的审美：正能量的校园文化

在江苏“大学叙事”的创作表现上，尤其是50年代的小说，表达出积极乐观的人生态度，满怀时代责任感的创作主题思想。“大学校园小说中的‘大学人’，由于他们身份的特别、成长环境的特殊、文化教养的特出，因而在他们的人格世界里具有较高的人格精神：热爱科学、向往文明、追求理想、崇尚自由、感受新潮。这些人格精神不断凝聚升华会转化为较强的人格力量，如

¹作者简介：吴延生，淮阴工学院人文学院副教授 223001

本文为作者主持的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江苏‘学院题材’小说研究”（项目号：15ZWD003）、淮阴工学院社科研究课题“‘大学叙事’观照下的大学校园文化研究”（项目号：16HGS009）阶段性成果。

道德力量、意志力量、智慧力量等等,从而对他人产生感染,对周围产生鼓舞,对社会产生影响。”^[1]

1. 勤奋好学的禀赋

大学是知识的殿堂。每一个即将升入大学的学子也都抱着这样的心理走向向往已久的大学去吮吸知识的乳浆。这是“大学叙事”必须面临和面对的生活场景。如《大学时代》对北方大学工科学习情况的再现,既有以教师形象出现的徐鸣老教授、机械系系主任顾巍为代表的授业者,也有被他们榜样的力量感染着的一群勤奋好学的受业者,如刘向明、赵敏、郭亚、刘岚、魏永斌等。以刘向明为例,他出生工人家庭。在父亲的影响下,他自小就对刀具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后考取了技工学校刀具班。毕业实习时便成功革新了一种刀具。因其在刀具革新方面所展露的出色才华被北方工业大学机械系党总支书记兼系主任顾巍教授发现,并在顾巍的直接关怀与帮助下进了港城开办的工农高考补习班,后考入北方工业大学机械系金属切削工具专业就读。但由于高考后在没得到充分休息的情况下立即钻进他的技术革新中而病倒,直至开学后一个多月才得以入校报到。

作为技工学校出身的刘向明学业基础较差,加之落下一个多月的课程,在学习方面面临较大的困难。“流水般的公式、概念,从授课老师的嘴里涌出,思想上稍一溜号,回头来就跟不上老师飞驰而去的思路,下课后必须立即设法补上,方能在下节课课上茬儿。现在,刘向明拉了一个月的课,当然就会懵头转向了。”由于王守维教授的故意刁难,《高等数学》课刘向明只考了三十分。但在顾巍和同学们的帮助下,倔强的刘向明利用寒假在校补习。不仅跟上了班级的学习进度,在补考时还取得了良好成绩。在小说第六章《不愉快的寒假》中还有侧面的旁证材料,如赵敏寒假回苏州,和女友游园时,“赵敏也去寻找地方,但就在剑池不远的一块岩石上,坐着一个佩着‘交通大学’校徽的学生,他手里正捧着一本书在专心致志地看着;赵敏一眼便看出这位学生看的是‘高等数学’。触景生情,她不由得喟然长叹一声。”从这些细节描写上看,当时并不是哪一所高校,而是众多高校的大学生们都在为国家的发展而勤奋学习。

2. 科学研究的向往

建国后中国高等教育院系调整,大学培养方式变更,这在 50 年代大学生生活中投下了时代的印记。如强调课堂学习与社会实际的结合,增加考试时的面试环节。这样的教学模式决定了勤奋好学的大学生有意识地去培养自己的科学研究的兴趣,这是实现课程学习与社会实际相结合的重要环节。《大学时代》描写周恩来总理在建国后发表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中写道:“在社会主义时代,比以前任何时代更加需要充分地提高生产技术,更加需要充分地发展科学和利用科学知识。”在这样时代背景感召下,全国高校师生对科学研究的向往之情溢于言表。《大学时代》再现北方工业大学徐鸣、顾巍等教授们对金属切削刀具的执着研究,对学术的专注,对大学生们科学研究兴趣的影响更是贯穿于书中。刘向明进入大学第二年,新开了一门专业课《金属切削原理》,“这一研究刀具与工件矛盾统一运动规律的新兴学科,刘向明对它向往已久了。”课余便倡议和赵敏、郭亚、魏永斌等组织刀具研究兴趣小组。且全书基本围绕刘向明的刀具研究,直至在科学杂志上发表论文,并且在校科学大会上宣读论文等活动过程展开故事情节。

3. 高尚信仰的追求

人生信仰是多层面的。有对某种主张或生存方式的执着。如陈白尘写于上世纪 20 年代的长篇小说《一个狂浪的女子》(芳草书店),塑造了一个 20 年代上海大学生韩雨珍的形象。由于家贫,为了求学,独自努力奋斗,写稿卖文,维持在大学读书,不得以甚至典当棉袍维持生计。这是个人信仰。当代作家张抗抗的短篇小说《夏》(《人民文学》,1980)写北国某大学中文系的女生岑朗、吕宏等当代大学生明确地提出了消除社会各种消极思想影响,创造一个健全的充满活力的生活环境的问题。如果说《夏》追求的是社会信仰,那么《大学时代》中刘向明、刘岚、魏永斌等同学对团组织的关切与靠拢则是政治信仰。

正如作者程树榛在其自传《坎坷人生》第二章里把其称之为“组织生命”、“政治生命”,说明在那年月人们尤其是青年大学生把入团、入党看得神圣而庄严,是人生最高境界的追求。魏永斌属于作者描写的“中间人物”。自小在祖父的教导下好好读

书。进入大学后仍然独自刻苦学习，“他学习时的精神专一，也是一般人所望尘莫及的。比如在政治学习讨论会上，大伙儿争论得像开锅的粥，他却可以借此时间做完高等数学的‘课外作业’；而在别人高声谈笑时，他又可以静静地背诵德文单词。”随着刘向明各项工作展开得有声有色，并取得了成就，他逐渐改变了自己的看法。不仅积极参加了刘向明的科研小组，后来还成为其中的骨干力量，并积极要求向团组织靠拢。通过自己的不断努力，其政治素养和科研水平都有较大提高，还在刘向明、郭亚的介绍下顺利加入了团组织。这充分说明，“个体只有参与到科学知识和技术进步的共同进程中，才能消除强烈的人生消极感。”^[1]

4. 纯真情感的培养

在人际交往中情感是维系彼此友谊的粘合剂和催化剂。作者也始终把情感描写作为创作的重要环节加以处理。亦如克地在《美感》里谈到：“艺术创作中情感表现的独特之处是作者除对人物形象作情感的评价之外，还必须对作品中的人物的种种具体的情绪和情感进行设身处地的体验，许多作家从切身的创作经验生动地说明了这一问题。”^[2]“大学叙事”的作者都是根据自己的切身体验和校园经历，把这种对生活的理解熔铸于笔下的人物生活。如“北大三部曲”（《北大女生》《北大男生》《北大先生》）的作者邮亭，时为北大研究生，根据自己所见所历反映北大校园生活。

《女大学生宿舍》（《芳草》，1982）作者喻杉时为武汉大学中文系学生，同样把自己的情感注入到女大学生 305 宿舍“五朵金花”——夏雨、骆雪、宋歌、辛甘、匡筐的身上，表现她们互帮互助亲如姐妹的同学情谊。同样，《大学时代》的作者程树榛于 1949 年读初中时就入了团，1950 年阴差阳错地“脱团”了，1953 年考上了天津大学机械专业，1956 年重新提出入团申请并加入团组织。在大学得到了同学们的关心、信任和理解。这段纯真同学之谊，深深打动了她，催发他在实习期间拿起笔来创作《大学时代》。在《大学时代》里，刘向明因病延迟一个月报到，功课跟不上，以致补考。赵敏、郭亚、魏永斌等同学真诚地予以帮助，结下了深厚的情谊。

二、理性的审丑：亚健康的校园文化揭示

1. 人生价值的贬低

无论是文本反映出的大学校园，还是现实的大学校园，都可以看到令人揪心的现象，那就是“大学人”群体大多存在价值观失落或者弱化的现象。首先，表现在理想信念的缺失。伴随着经济全球化日益深入，潮水般涌入的各种文化思潮和价值观念，冲击着“大学人”的思想。其次，腐朽落后的生活方式也侵蚀着“大学人”的心灵。“大学人”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政治信仰迷茫、理想信念模糊、价值取向扭曲、诚信意识淡薄、社会责任感缺失、艰苦奋斗精神淡化、团结协作观念较差、心里素质欠佳、道德滑坡等问题。《高等学府》中的尚金堂和杨小兰，作为大学的教育者和管理者，本应以身作则，塑造为人师表的典范，但却各自背叛自己的家庭，发生不正当的关系。尚金堂对自己所犯的错误未加以反省，甚至在他的妻子为他生下儿子后，望着杨小兰想：“我是真的喜欢你，但这丝毫不影响我喜欢妻子。我是真的喜欢妻子，但这丝毫不影响我喜欢你。”作为有妇之夫，作为有夫之妇，他们二人的这种不顾伦理道德的行为只会自毁其身。

《双山》里教务处长曾芜辽是文化界人，可笔下却半点文化没有。“像样的文章写不像，书法更不行，绘画则一窍不通。”能当上教务处长全靠贾弘毅副校长的提携。正所谓“学校的官职好比古代有位无权的闲职，无能得很”。而贾弘毅不服正校长一人独揽大权，于是私下里栽培了不少党羽，曾芜辽可以算得上是他的心腹。校长副校长的职务多半与学问无关，都只是摆设，只“想着怎么往上爬”。在宴会上，贾校长为讨好马会长，说他留学归来的儿子到“京大”来的话，直接就做得校长助理。曾芜辽也跟着拍马屁说愿意让出自己的职位。可见在京华大学也是有和《围城》中三闾大学一样的“关系户”。

2. 学术研究的弊端

自古以来，知识分子一直备受人们尊重，因为他们潜心治学，不断追求自我新境界，不断追求学术的发展。然而，“后新时期”

以来,随着校园小说的日渐丰富,我们看到了象牙塔里知识分子的另外一面。泯灭良知与苟且钻营构成了高校学术生态的灰色基调。如裴文的长篇小说《文人》里的校长屠圣贤在位多年,在东方大学,“他早就没有独立的学术言论,也早已不知不觉堕落到连一堂专业课也上不起来的地步。他拿了个国家项目,为了结项,全校十多位处长愣是在北京呆了一个暑假,各处打点,各处安排,组织评审。这算个什么本事!”就是这样的不学无术之人,“从上任校长开始,申报院士工作就已经全面展开,科技处和人事处联合成立了十个人工作小组。由主管人事的副校长贾传贵亲自负责。”可“多年申报院士未果”。

在关键时刻,一心想挤入副校长位置的美术学院院长武有田,利用好友奚奇的关系,带着支票、现金及银行卡飞往北京,借助“满满现金的一只密码箱,四箱高级洋酒,支票、银行卡买通了第九位也是关键一位评委陈慎言,使得屠圣贤顺利通过院士评审。后来还荣膺全国著名大师的殊荣”,“一次性获得一百万元奖励金,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享受政府部级行政官员工资及相关待遇。”学术竟堕落到权、钱的苟合。一年一度省级规划成果评奖,在中山陵五号大院贵宾楼举行。规划办副主任谭凤仙找到评委会副主任武有田为其表弟评上三等奖(去年武有田就为其搞到项目而评上学校最年轻的副教授。武有田收了谭凤仙两万元的好处费)。当天《新金陵日报》刊发获奖榜单,“一等奖之上还有一栏特等奖,获奖者只有一人——武有田。”就连跟随武有田做评奖秘书的韩瑶瑶都看明白了:“评奖只是金钱、关系、利益博弈的结果,跟成果的思想性、独创性、学术性没什么关联。”更有甚者,为了睡上女博士生韩瑶瑶,武有田为其代写论文发表。学术竟然没有了廉耻,失去了学术的正义和尊严。

3. 规章制度的虚位

制度文化不仅体现了学校的管理文化,而且作为文化建设的重要保障,它彰显了学校办学的价值追求和文化导向。“科学的校园文化制度,能增强学校对师生员工的约束力、吸引力、凝聚力,有助于培养朝气蓬勃的学校风貌,增强师生员工对社会文化的辨析力,以自觉抵制社会上各种丑恶现象的侵蚀,使他们能在复杂的社会中把握准人生的坐标。”^[1]但现实中的大学制度文化表现出不健全、缺位、错位或人为干扰的教条僵化的现象。如《变革》充分细致地描写了津海工商大学在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等全国或全省统一考试中屡次出现作弊现象。学生利用各种途径从有关权威人士手中购买试卷、答案,考试中发送到学生手机中的答案与标准答案相吻合,有时直接就是教师阅卷评分的参考答案。试卷到底是怎么流出的呢?何曾进校长知道是学校出了大内鬼,可是没有人动真格彻查。《变革》中还多次提到“点招”,这已成为高校公开的秘密。“点招”给学生家长带来希望,也给握有“点招”权的人太多的发挥余地,分数不够用钱补。

三、江苏“大学叙事”的地域性

1. 地缘感与亲切感的结合

研究文学的地域性应关注作家的地域文化濡染,因为每个人都不可能摆脱具体的文化环境。形诸笔下,江苏作家对故乡情有独钟。如宋浩浩的《双山》原名《蓝跳蚤》,后直接改用苏州北端张家港的故乡地名“双山”作为小说的命名,还因为小说的主人公林涵韵就是双山人。故乡是作者心灵和创作的后花园。双山的人和事,作者不是作为言说者的身份,仿佛是亲历者的角色,娓娓道来。读者读来没有“隔”的感觉,也似身临其境。生于南京毕业于南京大学中文系的叶兆言,在中篇小说《五月的黄昏》(《收获》,1987)写到南京鼓楼医院、石子岗殡仪馆、玄武湖、珠江路、汉口路、新华社、清凉山古石头城。另一中篇小说《挽歌》(《上海文学》,1991)写到玄武湖、栖霞山、胜利饭店等。江苏丹徒作家格非《欲望的旗帜》写到紫金山、玄武湖、金陵饭店、新街口等。黄梵《第十一诫》写到南京某大学,“这座大学建在石城山脚下,像个小镇,唯一的区别是,它有许多树林和羊肠小道。”

这里特别要谈到现为南京大学教授的女作家裴文在其《高等学府》中,写到中山陵、清凉山、鼓楼、妙峰山、玄武湖、秦淮河、下关、琅琊路小学、成贤街、金陵饭店、大行宫、延龄巷等。特别是书内附有鼓楼、玄武湖、中山陵、秦淮河、鸡鸣寺、前湖夏天、九华山等整面插画,其用心明矣!还细致叙述了“南唐二陵”,即李昇的钦陵、李璟的顺陵建陵时间及其历史文化价值。如此等等,不仅彰显了文化南京的厚重历史,也凸显了南京地域文化的独有韵味和魅力。

再以裴文 2016 年出版的长篇小说《文人》为例,提及甚至反复写到南京的相关地域文化景致,大致归纳下,有六朝古都南京的街巷:秦淮河的露天音乐广场,把东方大学分为东、西院的楚汉路,马台街的小商品夜市,下关干货批发市场,驴子巷,长江大桥建宁路,南艺后街,南京朝天宫古玩市场;山水景致:据于南唐的“青玉井”,据说是南唐后主李煜命名的,长江中雪浪岛疯长的林木,秦淮河的堤岸,四象桥边的水墨秦淮,东郊乌鸦山的尼姑庵的萧疏,玄武湖畔的翠堤园、亭子,郁郁葱葱的龙虎山,中山陵琵琶湖畔的竹亭小榭的湖光山色,山峦绵延、水域密布的马虎山。建筑:蜿蜒的古城墙,堂皇的天妃宫,南京四号码头,秦淮区工艺品厂,江北浦口的秣陵学院,江北仙林新校区,南京工业大学,东方大学院内的苏州楼、常州楼、镇江楼、徐州楼、盱眙楼、盐城楼、高淳楼、扬州楼等。餐饮:螺丝转弯巷的各色小吃,金陵饭店金海湾日本料理菊花节,夫子庙秦淮人家的聚餐,韩瑶瑶招待秦坤喝的南京正宗雨花茶,江边希尔顿饭店的餐饮,中山门外月牙湖畔的扬州富春饭店,紫金山庄敞亮、高挑的餐厅。天气:六七月间的“黄梅”天气。流俗:历史上南京文人狎妓的习俗。这些充分验证了《文人》中反复强调的“南京用名称记录历史,不用建筑”的特点。

2. 冲淡平和与悲悯情怀的结合

从宏观文化学角度看,历史上江苏由于并非中华主流文化的发源地,儒家文化对其渗透较之中原为浅。受吴文化特别是富于柔性雅慧、韧性随和的“水文化”的熏陶,古往今来生于斯长于斯乃至过境文人墨客大多以审美诗性作为自己的生命色调与毕生追求,构成了江苏作家的“诗化文人”的身份认同。“身份认同的这种流动性、构成性为我们理解江南人文传统、江苏地域文化之于江苏作家的文化取向与审美选择的重要影响不无裨益。”^[1]“这种诗意文化氛围从古至今缭绕不绝。在它潜移默化的熏染下,江苏作家的内心深处都或多或少潜藏着一脉文化乡愁。”^[2]在这样水乡地域文化情韵滋养下的江苏作家,他们按照自己的审美理想构建人生,表现一种淳朴自然却具有勃勃生机的生活境界,呈现一片清新淡雅却具有诗情画意的艺术气质,彰显温柔中和的“水韵江苏”的地域文化特征。从文本表现看,呈现出一种冲淡平和、节制婉约的叙事风格。

(1)叙事策略有度。小说叙事是展开故事情节、展现生活的重要窗口与形式。从叙事可以看出作者的生活态度、价值维度,因而对于小说家而言无不注重叙事策略。有的呈现宏大叙事,如汪洋恣肆,波澜叠起;有的细微展出,如涓涓细流。江苏大学校园小说的作者们处于中间状态,表现出冲淡平和的叙事策略。中篇小说《行云流水》,从日常普通生活入手,拨冗去杂,直白人生困境,复制出开放年代里知识分子的日常生活状态。作者探索这一社会问题,以略带无奈的笔墨写出了知识分子为生计而忙碌的尴尬,产生了十分强烈的反讽效果。知识分子贫困化是现实无奈的缩影。

大学力学副教授高人云对教师工作恪尽职守、一丝不苟,以致超负荷工作而生病。在住院期间想的依然是学生的课堂和作业,以及自己和严航未合作完成的论文。然而就是认真做事、诚信待人、追求心安的高人云,却在急速发展的生活中处处碰壁。胃病发作买不起高价药只得走姐姐后门开药。高人云去理发因未带足钱而受理发店小姑娘的奚落和嘲笑,自己最为看重的知识分子人格在小姑娘眼中变得一文不值。与此同时,菲薄的收入常令高人云捉襟见肘,他只能在饭店尴尬地看着自己的学生大鱼大肉,而自己只吃一碗便宜的面。论文要发表,必须先交费,可囊中羞涩。女儿复读还等着钱呢,末了,求助于父母解决。

高人云住在陈旧房子里用着陈旧的电器,即使拼命工作也无法让家庭生活得以改善,妻子和儿女的抱怨更是让他感到尴尬和窝囊。他秉持严谨的治学态度,坚守知识分子的清高品格,却被同事和家人认为是死板迂腐。高人云作为一个高等学校的教育者,满腹笔墨,却无法摆脱生活的困窘状态,也无法得到社会和亲人应有的理解和尊重,只能自我揶揄和解嘲,无可奈何地面对金钱化、物质化的社会而惶惶不可终日。作者以反思的角度,温和的叙述,不乏对置身世俗化的高人云们讽刺和嘲弄,但同时出现的还有几分同情。“方方并未真正拒绝对作品中的一切进行价值评判,只是她的评判绝非道学家的评判;方方的评判不是主流写作式的义正词严的痛斥,而是作呕或淡然一笑”^[3],采取了一种平淡冲和的叙事策略。

(2)刻画人物有度。小说家塑造人物,不只是为人物的思想、品格下注脚,而更为重要的是揭示出人物成长过程的复杂性。“每一个人都是一个整体,本身就是一个世界,每个人都是一个完满的有生气的人,而不是某种孤立的性格特征的寓言式的抽象品。”^[4]既然是一个有“生气的人”,他的秉性、气质、为人、情绪、嗜好等一定各不相同。江苏大学校园小说里,没有“恶”人

也没有“好”人,而是中和地写出了人物的成长的复杂性。《大学时代》里的刘向明等虽然好学上进,但也出现急躁的情绪反映。《文人》中的武有田即便收受学生家长的现金,在仕途上逢迎媚上,学术造假,但毕竟未坏到那“份上”。既让人对他有“恨”,也觉得这个人还有点人情味。

四、江苏“大学叙事”的不足辨析

江苏大学叙事在描写校园生活、呈现大学校园文化上取得了骄人的成绩,尤其是江苏地域文化的彰显。汪曾祺的《日规》、裴文《高等学府》《文人》、黄蓓佳的《腾之舞》(《钟山》,1992)、叶兆言的《死水》(江苏文艺,1986)等众多的作品明显地带有了江苏地缘诗学的色彩——温润中和。这既是其优点,也是其不足。首先在于江苏小说家文化认同上的“文人身份”在审美上最突出的表现是才子气质,而才子气质使他们将更多的注意力集中于诗意、唯美、情调等层面,具体表现为对宏大话语的疏离,追求人性的淡雅与平和,这种追求限制了建构鸿篇巨制的能力,导致了大气魄大境界的宏大叙事架构的弱化。

其次,从作者层面看,基本上是大学教授、学者(葛红兵为上海大学教授、格非为清华大学教授、曹征路为深圳大学教授、裴文为南京大学教授、黄梵就职于南京理工大学诗学研究中心、尹平为南京审计学院教授),其他如大学生群体、社会群体参与进来较少。这与省外相比作者群体的多元化很不协调。再次从作品数量看,江苏作家多偶尔为之,不像省外作家们已不满足于用单一的一部长篇来表现大学校园生活,而经常以大学校园小说三部曲的形式,如马瑞芳“新儒林外史三部曲”的《蓝眼睛·黑眼睛》《天眼》《感受四季》,袁越“大学三部曲”的《大学城》《大学恋》《大学梦》,等等。还有的作者试图通过多部或彼此独立而又相互关联的一组小说全景式地鸟瞰大学校园的众生相,多角度地透视大学校园的“溃疡点”。如梁晓声的学子系列,包括《学子》《贵人》《选修课》《表弟》等;史生荣的《感谢小姐》《美女教授》《骆驼实验》《五号病》《学者》《老板教授》《教授不教书》《所谓教授》《所谓大学》《教授之死》等;汤吉夫的《副教授买煤记》《本系无牢骚》《新年年年有》《龚公之死》《漩涡》《宝贝儿》《葛懿教授》《大学纪事》等。江苏“大学叙事”没有出现一个三部曲的形式,单个作家的系列也不多。

人们常说,文学是社会的神经,知识分子是社会的良心。只有高等教育率先发展,实现中国梦才有基础和动力。就江苏而言,提出的文化强省才有支撑和保障。因为文化创造的作为,有很大一部分是由文学来担当的。这就进一步凸显了江苏“大学叙事”研究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但是也应客观地看到,新时期以来江苏“大学叙事”落后于有些省份。江苏作为现代“大学叙事”的最早诞生地,是什么原因让陈衡哲、陈白尘、叶圣陶、钱钟书先生开拓的“大学叙事”沉寂下来?这不能不引起人们深入、深度、深刻、深沉的思考!

注释:

1[1]吴延生:《现代文化视阈中的新时期初大学校园小说——以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的〈夏〉〈女大学生宿舍〉为例》, [上海]《名作欣赏》2010下(10)。

2[1][美]叶文心:《民国时期大学校园文化(1919-1937)》,冯夏根等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77页。

3[2]转引自沈阳师范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组:《中国现当代文学论集》,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97页。

4[1]刘刚、王文鹏、陆俊杰:《多维大学校园文化研究》, [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56页。

5[1][2]张光芒:《混沌的现代性》,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69页,第270页。

6[3]戴锦华:《涉渡之舟——新时期中国女性写作与女性文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25页。

7[1]转引自张德林:《现代小说美学》,[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271 页。